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編

宋代文化研究

第九輯

巴蜀書社

宋代文化研究

第九輯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巴蜀書社

2000年8月·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宋代文化研究. 第9輯/四川大學古籍所編. 一成都: 巴蜀書社, 2000. 8

ISBN 7—80659—104—4

I. 宋... II. 四... III. 文化史—研究—中國—宋代
IV. K224. 0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38054 號

責任編輯: 李衛紅

特約編輯: 李文澤

封面設計: 王蓉貴

宋代文化研究 (第九輯)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 (028) 6656816

發行科電話 (028) 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四川省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中心彩印廠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15.875

字數 360 千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ISBN 7—80659—104—4/I·42

定價: 48.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K203
23

182608-610
P1-3

目 錄

蘇軾研究史序·····	王水照 (1)
蘇軾研究史序 ····· (臺灣)	陳新雄 (5)
蘇軾研究史序·····	曾棗莊 (9)
蘇軾書畫的歷代評價及影響 ····· (臺灣)	衣若芬 (20)
“推明上古之絕學”的東坡《書傳》 ·····	舒大剛 (32)
《四河入海》 ——日本四僧的東坡詩注 ····· (日本)	池澤滋子 (51)
韓國蘇軾研究述略 ····· (韓國)	洪瑀欽 (76)
“橫看成嶺側成峰” ——美國學者蘇軾研究面面觀····· (美國)	唐凱琳 (101)
蘇、辛詞的異同 ·····	曾棗莊 (126)
蘇東坡詞編年考 ——薛注蘇詞編年商榷之一····· (日本)	保莉佳昭 (143)
朱熹詩詞編年箋注前言 ·····	郭 齊 (156)
辛詞證杜 ·····	向以鮮 (184)
略論宋代文獻在宋代語言研究中的語料價值 ·····	李文澤 (196)
試論晚宋農業經濟衰落的原因 ·····	張金嶺 (209)

宋初御史臺最重獄事說

——兼釋宋初御史中丞多用純厚人 …………… 刁忠民 (226)

宋真宗對遼戰爭考之二：遂城之戰 …………… 王曉波 (236)

宋朝官方圖書機構考述 (上) …………… 郭聲波 (247)

譙定所謂“見乃謂之象”考釋

——兼論與朱熹《易》學的分歧及其意義 … 粟品孝 (266)

讀《宋史·張方平傳》

——北宋中期士人交際論考 (一) …………… 王智勇 (273)

章惇傳論

——從章惇的宦海沉浮看北宋中後期政治風雲

…………… 黃錦君 (283)

俞琰編年事輯 …………… 楊世文 (295)

宋僧著述考 (一) …………… 李國玲 (325)

朱熹答陳亮書補遺二則 …………… 郭齊 尹波 (335)

試論唐宋以後三峽地區寺廟文化及其旅游開發價值

…………… 李勇先 毛麗姪 (339)

考古發現北宋詩人宋京墓 …………… 榮遠大 劉雨茂 (357)

古籍電腦化的字庫問題 …………… 吳洪澤 (364)

范祖禹“臺諫手段”評析 …………… 楊 然 (371)

蘇洵易學淺論 …………… 金生楊 (379)

蘇轍《古史》版刻考述 …………… 桑海風 (391)

日本宋史研究文獻目錄

(1982~1997年) …………… 吳洪澤 王小紅 (396)

1997年宋遼夏金文化研究論著目錄 …………… 王蓉貴 (440)

補白：(19) (100) (195) (208) (294) (324) (363) (370)

蘇軾研究史序*

王水照

棗莊先生是我訂交二十多年的畏友，也是學蘇、治蘇的學術同道。他囑我爲其新著《蘇軾研究史》作序，我實愧不敢當；但就這部新著的書內之豐富學術含蘊和書外的令人扼腕驚服的特殊意義而言，我又不能也不敢拒命。

說來有緣，我們是從1980年關於蘇軾的一封信簡的評價之爭而開始結交的，真應了俗話所謂的“不打不成交”。嗣後，我們一起參與中國蘇軾研究學會的活動，互贈著述，交流心得，友誼日深，但仍時有學術交鋒，如1984年關於蘇軾詩歌分期的討論。我們之間的爭論和討論，雖然連《蘇軾研究史》上的小插曲也算不上，却是我們個人爲人、治學的一種難得的鍛煉，或許得

* 明年（2001）陰曆7月28日是蘇軾九百周年忌辰，由曾棗莊教授主編，中外一些學者共同撰寫了一部《蘇軾研究史》以茲紀念。現已基本脫稿，爲廣泛徵求修改意見，特選載了該書一些章節，盼中外專家學者不吝賜教，以利本書修訂。

益于宋人交友之道和蘇軾自由爭辯宗風的潛在孳乳吧。

在當今蘇學研究中，棗莊先生是著述豐碩、自成一家的著名學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蘇學研究成果的數量來看，并世罕見其匹。他的評傳系列：《蘇軾評傳》（1982）、《蘇洵評傳》（1983）、《蘇轍評傳》（1995）及《三蘇傳》（1995）；他的三蘇文集箋注整理（合著）：《嘉祐集箋注》（1993）、《樂城集》（1987）、《三蘇選集》（1993）；他的資料彙評系列：《蘇詩彙評》、《蘇詞彙評》、《蘇文彙評》（1999），等等。面對這三大系列以及他的“文存之一”的《三蘇研究》（1999）中的大量論文，我們不禁肅然動容，被他焚膏繼晷、嘔心瀝血，以學術為生命的精神所深深感動。還應提到，他除了三蘇研究外，還主編了《全宋文》（約1億字，1987年開始出版，已出50冊）、《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1200萬字，1999）這兩部大型總集和類書，堪稱宋代文獻資料庫，其學術貢獻毋庸贅述。《宋文紀事》也是治宋學者的案頭必備之書。我曾戲稱他為“拼命三郎”，語雖有失嚴肅，却是實情。

棗莊先生的蘇學研究不僅成果數量驚人，且已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他既把蘇軾放在北宋的整個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北宋文學家年譜》即以年譜形式所作的衆多作家之交游考），對蘇氏父子均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從同中之異的比較對勘中揭示蘇軾獨特的思想面貌與藝術面貌；又如，評論、傳記、年譜、文集的全面整理等有關“蘇學”的種種專題，他幾已囊括殆盡，論述性、資料性兼具，用多種著作形式去逼近同一研究對象，也使他的研究富於整體感與系統性。

這部《蘇軾研究史》，更使這種整體感與系統性得以大大加強，確切地說，是研究的整體感與系統性的自身邏輯發展的必然。我最近為門生王友勝君的博士論文《蘇詩研究史稿》所作序言中曾說：

幾乎從蘇軾生活的時代開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長達九百年的蘇軾接受史。這部接受史，以 2700 多首蘇詩、300 多首蘇詞、4800 多篇蘇文為解讀接受的對象，又分屬以理論闡述為主的學術研究、以作家創作借鑒為特點的文學創作，以閱讀鑒賞為內容的大眾閱覽等三個層面，採取評論、箋注、編選、年譜、傳記、吟誦、唱和、刊刻、傳抄等不同傳播接受媒介形式，具有十分豐富深刻的內涵，理應成為“蘇學”研究中的一個有機構成。但迄今未見有關論著問世，不能不是很大的缺失。

友勝君就蘇詩研究過程進行了再研究，對這個“缺失”作了初步的彌補；棗莊先生的《蘇軾研究史》則在廣度和深度上對填補這一學術空白起了極大的作用。棗莊先生的新著又使我發現上述自己的說法應作兩點修正：一是把蘇軾接受史僅停留在蘇詩、蘇詞、蘇文等文學作品上。若從文學學科立論，當然也是可以的，但在外延上實可再作伸展。新著論述對象除詩、詞、文外，還涉及書、畫，乃至經學等方方面面，其範圍之廣、開掘之深、論述之要，應是第一部全面系統的蘇軾研究史。其中不少章節先在報刊上發表時，已引起學界的矚目。我也大都拜讀過，對不少新穎論點留下深刻印象，但不免有窺斑嚙臠之憾。如今全豹全鼎在眼，快何如之！二是把蘇軾接受史僅停留在本國範圍之內。若從中國文學學科立論，這也大致說得過去；但蘇軾是一位有世界影響的偉大作家，其接受史應在內涵上再作深化。棗莊先生廣邀各國友人共同撰作，設立日本、韓國、歐美等國的蘇軾研史述略諸章，讓讀者具體了解蘇軾如何跨出國門而為域外人們熱愛與接受的過程。這在已有的成果中，是并不多見的，相信會引起研究者們的興趣。

棗莊先生這部新著，是內容充實、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蘇學著作，也是他戰勝病魔後奮力拼搏的產物。我讀到的，不僅僅是方

塊漢字，而是讀書人的近乎痴迷的自信，人生信念的自持與自律，以及實現一己生命價值的自豪。棗莊先生不幸于 1998 年 11 月罹患癌症，但他鎮靜自若地奉行自己“作最壞的思想準備，盡力往好處努力”的“老哲學”，懷抱平常之心，挑戰病魔，終於成爲一位勝者。今年 3 月和 5 月，我在上海和南京的兩次學術會議上與他晤見，他精神飽滿，談笑風生，完全與往昔一樣，絲毫覺察不出剛與死神搏鬥過的踪影。當他告訴我《蘇軾研究史》竟在病後黽勉從事，已完稿歲事時，我再一次感佩他的堅毅沉着，再一次感受到在“畏友”面前的自愧。

我和棗莊先生年相若，稍長幾歲，都已過了花甲，進入人生之旅的晚年。我想起了南宋趙蕃的“難齋”，他命名此齋，乃取“末路之難”之義，典出《戰國策·秦策五》：“詩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難。”末路，此非貶義詞，而指最後一段路程，以喻晚年。晚年之難，一言難盡，思維遲鈍而記憶銳減，精力不支而雜事叢脞；衰病日尋，猶白香山所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更是難逃之劫。但趙蕃以“難齋”自警，年垂知命，自視坎然，仍勤勤問學于朱熹，執弟子禮甚恭，努力在文化事業上續有建樹。棗莊先生的晚年之難，實超出常人數倍，但他以克服“末路之難”爲宗旨，以精進不息爲鵠的，這部新著就是生動的例證。如何應對“末路之難”，也是我自己的人生課題。

我想不出怎樣結束這篇短文，只好再重復一遍蘇詞：“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蘇軾研究史序

(臺灣) 陳新雄

稍有知識之國人，談及蘇軾，幾乎無人不知。蘇軾乃中國讀書人之典範，亦即士一階層，所願效法之模範，懸為行為之準則。《宋史·軾傳》曰：“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雖然在世之時，受小人忌惡擠排，不能安于其位，甚至于遭陷害，被繫于御史臺獄；六十歲後，尚被遠貶至海南。可謂飽受折磨，歷盡艱難。然人之一生，為忠、為奸、為君子、為小人，未蓋棺論定，實難以確斷。白居易《放言》詩云：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著。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宋史·蘇軾傳論》堪稱軾一生的蓋棺論定：

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俊，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

“特立之志”，即獨立意志，不為利誘，不為威迫，行其所當行，為其所當為：所謂“邁往之氣”，乃孟子所言“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浩然正氣。即蘇公《潮州韓文公廟碑》所云：

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蘇公此段議論實文文山〈正氣歌〉所自出，而《宋史·蘇軾傳論》最後數言評斷，最足以代表蘇軾一生之立身行事。《傳論》云：

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蘇軾之所以為蘇軾，即在其不易所為而求免禍之氣質。所以蘇軾二字，即代表中國文化所陶冶出的讀書人之典範。言及蘇軾，即顯現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典型。

當蘇軾首次遭奸小何正臣、舒亶、李定等誣陷，被貶謫至黃州，充當團練副使閑差之際，其友人李常賦詩以慰，言詞哀戚，情緒黯然，蘇軾作書相報曰：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于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

處此困窮之境，顛沛流離之際，所發此言，直擲地有聲，千載之下，猶見其生氣凜然，實足使貪夫廉，懦夫立。吾輩尚友古人，捨此天下第一等人，尚友何人！

蘇軾不僅氣質感人，在文學史上，亦爲才不世出之英傑。其所處時代，凡文學上具有之文體，若古文、若駢文、若詩、若詞，甚至于字、畫，幾無一不善，且創作豐盛，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

中國文學之分類，大略說來，不外詩、詞及文章三類，但自古以來之作者，三者向難兼善，精于文章者，每每短于詩詞，精于詩者，亦難兼善詞與文章，其精于詞者，若求兼擅文章與詩，則尤爲罕觀。本來文之與詩，詩之與詞，不僅形式體制之差別而已。此三者之風格與韵味，實有其本質上之殊異：創製技術，亦大不相同。古來雖有以作文技術以賦詩，以作詩技巧以填詞者，但決難使其三類作品，皆達第一流境界。就此而言，蘇軾確實雄視千古，睥睨百代。無論駢文抑古文，與古今大家相較，皆不遑遜讓。其古文人皆悉知，耳熟能詳，于唐宋八大家中，較之他人，絕不遜色：至其駢文，雖不若古文之彰顯，然在宋哲宗元祐元年，初任中書舍人，當制所行呂惠卿貶詞，早已風動四方，天下傳誦，作者固文辭鋒利，痛快淋漓；讀者亦感快如并剪，振奮人心。蘇軾之詩，無論古詩、近體、短篇、歌行，無不卓絕，實李、杜之後第一。東坡于詩，實具有李白之天才，加上杜甫之功力，故處處表現出其特殊風格。吾人稍默誦其詩，名句之多，古今詩人，亦罕有其匹，就此一端，已足見其功力深厚矣。蓋所謂名句，乃得我心之同然，先我拈出，故讀其詩，于心有戚戚焉。蘇軾之詞，卓然成家，巍居第一，豪放之詞，固其絕活；婉約之作，亦纏綿悱惻，哀婉動人。

蘇軾詩文之成就，除稟賦極高之天分及後天豐富之學識外，而余以爲，其小學造詣之深，文字、聲韻、訓詁痛下功夫，亦有致之。邵博《聞見後錄》云：

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復置行篋中。予謂：學者不可不知也。

正因為蘇軾平素注重小學，浸淫久，用功勤而造詣深，故于中國文字之形、音、義皆能確切掌握。猶如韓信將兵，多多益盛，作文賦詩時，遇有字不適切，即換他字，用字方面，毫無障礙，是以作文，如行云流水，行所當行，止所當止，無不賞心愜意，故表現于外者，乃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矣。

世人每謂從事小學研究，多斲傷創作靈感，然觀東坡之所為，實乃大謬不然。余既從事小學研究，復又酷愛東坡詩詞，而于東坡為人，尤為傾倒，浩然正氣，挺挺大節，特立邁往，有為有守。其文章詩詞，無不佳妙，迹其所以臻此高妙境界，非特無傷于小學之研究，抑且小學造詣之深，反大有助於文學之研究也。

曾教授棗莊，執教四川大學，錦江水碧，峨眉橫翠，鍾靈毓秀，才思曠逸。未識而前，久仰蘇學巨擘，著述宏富。迨晤面後，更一見如故，古人有傾蓋相知，君之與余，蓋不須傾，則已推心者矣。密州初遇，贈以詞云：“今朝相會喜盈眉，快飲何能辭老。”君亦以知己相許，特令以毛筆正楷書寫，君裱之于壁，時時指正，則尤具深意者也。近歲于蘇學也，膏油繼晷，兀兀窮年，手不停披，提要鉤玄，沈浸濃郁，含英咀華，閤中肆外，集其大成者矣。不僅此也，更約集大陸、臺灣、日本、韓國、美國諸地學者，共同撰述《蘇軾研究史》，發揚蘇學，可謂不遺餘力者矣。余既佩蘇長公之為人，又與君相知相惜，今其書成，盼余弁言數語，亦余所樂于贊襄者也。一為長公芳馥散于寰宇而喜，二為曾君蘇學集其大成而樂。故雖粗陋不文，亦不免于獻醜矣。是為序。

千禧年五月十日夏歷庚辰四月初七日陳新雄謹序于臺北市和平東路鏗不舍齋。

蘇軾研究史序

曾棗莊

宋孝宗在《蘇文忠公贈太師制》中說：“經綸不究于生前，議論常公于身後。”^①前一句精確概括了蘇軾的一生。

蘇軾（1036—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他是北宋的著名文學家。任何名世的文學家幾乎都是悲劇人物，任何傳世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是悲劇作品，蘇軾也不例外。有人說愛情是文學的永恒主題，我却認為愛情最多祇能算是文學的永恒題材，理想同現實的矛盾纔是人類社會的永恒矛盾，也是文學的永恒主題。我研究蘇軾，常常為他的偉大抱負及他為實現自己的抱負而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所感動，也常常為他的理想無法實現而哀嘆。他生活的年代，是北宋王朝的鼎盛年代，也是北宋王朝危機四伏的年代。在他生活的六十五年裡，宋王朝為鞏固自身的統治，進行過兩次大的改革，即所謂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蘇軾直接捲入了圍繞熙寧變法所進行的鬭爭。這一鬭爭幾乎長達半個世紀，導致的不是宋王朝統治的鞏固，而是北宋的滅亡。蘇軾從小“奮厲有當世志”^②，認為“致君堯舜，此事何難”^③。他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最後

竟“致”出了宋徽宗這樣的昏君、亡國之君，在他死後二十七年，北宋就滅亡了。宋仁宗讀到蘇軾兄弟的應試文章，喜曰“爲子孫得兩宰相”。但蘇軾從仕四十年，在朝廷任職的時間不足三分之一，而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是在貶所度過的，以至他在臨死前發出了“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沉痛哀嘆。可悲的現實和不幸的經歷是對他“致君堯舜”的美妙理想的無情諷刺。

任何真正的文學家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他們的作品充滿了對人生的觀察、思考和感慨。蘇軾也不例外，他的詩、詞、文充滿了儒、釋、道入世與出世、進取與退避等看似相互矛盾，實際又頗爲統一的思想。在他那看似輕鬆達觀、遊戲嬉笑的文字深層，隱藏着的是他痛苦的思索、徬徨、哀嘆、呻吟。讀他的作品，看不到他的眼淚，但感覺得到他的心在流血。林語堂的《蘇東坡傳》認爲蘇軾是天生的樂天派，李澤厚的《美的歷程》的看法却相反，認爲蘇軾是悲觀厭世者。他們各說對了一半，蘇軾恰恰是這看似矛盾的二者的統一。“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卷1《水調歌頭·中秋懷子由》）——這是達觀，也是悲觀，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念奴嬌·赤壁懷古》是蘇軾豪放詞的代表作，是一篇氣壯山河的作品，也是寄慨萬端的作品，通篇充滿了作者的美妙理想同可悲現實的矛盾。他本希望像“千古風流人物”和三國時的“多少豪傑”那樣建立功名，特別是希望像“公瑾當年”那樣少年得志。但是，可悲的現實却是“早生華髮”，一事無成，反落得貶官黃州，于是發出了“人生如夢”的哀嘆。他的《赤壁賦》力圖用老莊的聽任自然，隨緣自適，超然達觀的處世哲學來解脫自己貶官黃州的苦悶。作者通過客人“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洞簫聲，引出了主客間關於人生意義的一場對話，實際上都是作者的獨白，是他陷于深沉苦悶而又力求擺脫的矛盾心情的表露。作者通過客人之口說，像曹操這樣不可一世的英雄，都被時間的流水

洗盡了舊迹（“而今安在哉”），何況自己貶官黃州，已經“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還能在歷史上留下甚麼陳迹呢？“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人生太渺小了，太短促了！作者又不願沉浸在這種悲涼的思想中，于是搬出老莊的處世哲學來自我安慰說，要會想，從變的一面看，人生固然短促渺小；但從不變的一面看，“則萬物與我皆無盡也”。高官厚祿既“非吾之所有”，就只好“莫取”了；而“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可以盡情享受而又與世無爭。這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全文從泛舟大江有羽化登仙之樂，轉入“侶魚蝦而友麋鹿”的現實苦悶，而後又以“清風”、“明月”之樂自我安慰，最後以主客狂飲，酣睡達旦作結。“以杯澆愁愁更愁”，結尾處的“喜而笑”，實際上掩藏着難以排遣的苦悶。

蘇洵曾教育二子說：“士生于世，治氣養心，無惡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爲苟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蘇轍《歷代論引》，《樂城後集》卷7）蘇軾是牢牢記着這一先君遺訓的。他在政治上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後，就集中精力于著書立說。他很看重自己的三部學術著作，用蘇軾自己的話說就是：“撫視《易（傳）》、《書（傳）》、《論語（說）》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④但蘇軾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貢獻和影響，却不在他特別看重的這三部學術著作，而在他視爲“不足道”的文學藝術成就。理想同現實、目的和結果的差距實在太遠了！

“議論常公于身後”一句，是宋孝宗概括南宋初年爲蘇軾恢復名譽時說的話，但用來概括蘇軾逝世九百年來歷代對他的評價也是大體符合實際的。

中國有句成語叫做蓋棺定論。其實，情況很複雜，蓋棺也未必能定論。因爲論，不僅涉及被論的客體，而且還涉及論人的主

體。人死了，被論者的所作所爲已經完全結束，就客體言，似乎可以定論了。但恰恰因爲人死了，被論者不能爲自己辯解了，祇能任論者胡褒亂貶，論就更不能定了。就客體生前而言，有權有勢者如中國的歷代皇帝，他們蓋棺以前可由自己爲自己定論；蓋棺以後，他們自己爲自己定的論不再上算，也祇能由後人根據各自的需要來爲他們定論。無權無勢或權勢不如人者的情況恰恰相反，他們生前由有權有勢者爲他們定論。蘇軾生前歷盡榮辱浮沉，在他未仕以前，因爲與他人沒有利害關係，得到的幾乎是衆口一詞的好評。而入仕以後，特別是在捲入變法鬭爭以後，他的一些師友門生仍對他推崇備至，而變法派却把他罵得一錢不值，甚至把他投入監獄，遠謫黃州、惠州和儋州。可見蘇軾生前不但不能實現其“經綸”，也得不到公正一致的評論。

蘇軾“身後”，對他的“議論”確實是“常公”的，南宋、元、明、清各代對他的評價都很高。但也祇是“常公”而已，蘇軾去世後，在徽宗朝和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這兩個時段，對蘇軾的詆毀並不亞於他生前政敵對他的詆毀。

所謂南宋、元、明、清各代對他的評價都很高，也是就總體說的。在學術上，理學家們常批評他爲雜學，好在蘇軾自己似乎從未以純儒自居。在文學上，歷代都對他五體投地，但也不斷有人批評他手滑筆快，用典用韻多有可議之處，江西詩派、尊唐派對他也偶有微詞。

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奇才，是歷代研究得最多的文學家。就時代看，南宋、清代和最近二十年，蘇軾研究成果最多。清末民初陳衍在《知稼軒詩叙》中說：“長公之詩，自南宋風行，靡然于金、元，明中熄，清而復熾。二百餘年中，大人先生殆無不濡染及之者。”^⑥這是就詩歌創作說的，但蘇詩研究乃至整個蘇軾研究也大體如此。需要補充的是，對蘇軾的研究并非起于南宋，而是起于蘇軾生前，從蘇軾青少年時代起，就有對他的不少評